

# 假如日本 不曾偷襲珍珠港

史上**12**起關鍵事件的  
另一種插曲

What Might Have Been

Imaginary History from  
Twelve Leading Historians

二〇〇六年日本野球世界第一



安德魯·羅伯茲 (Andrew Roberts) 編  
黃煜文 譯

# 假如日本 不曾偷襲珍珠港

史上12起關鍵事件的  
另一種插曲

What Might Have Been  
Imaginary History from  
Twelve Leading Historians



二〇〇六年日本野球世界第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假如日本不曾偷襲珍珠港：史上 12 起關鍵事件  
的另一種插曲 / 安德魯·羅伯茲 (Andrew  
Roberts) 著；黃煜文譯。-- 初版。-- 臺北  
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6 [民 95]

面：公分。-- (ReNew : 18)

譯自：What Might Have Been : Imaginary  
History from Twelve Leading Historians

ISBN 986-173-070-2 (平裝)

1. 軍事－歷史 2. 戰爭－歷史

590.9

95006430

WHAT MIGHT HAVE BEEN : Imaginary History from Twelve Leading Historians  
Introduction and compilation © Andrew Roberts  
In each essay © 2004 by the writer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idenfeld & Nicolson,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ReNew 018

## 假如日本不曾偷襲珍珠港：史上12起關鍵事件的另一種插曲

作者 安德魯·羅伯茲

譯者 黃煜文

主編 郭顯煒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6-0933 傳真：(02) 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02) 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02) 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電郵：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電郵：citecite@streamyx.com

印刷 禾堅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ISBN：986-173-070-2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2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前言

安德魯·羅伯茲

「只要調偏一根琴弦，」《特洛埃圍城記》（*Troilus and Cressida*）的尤里西斯（Ulysses）說：「聽啊，接下來出現的將是多麼不協調的聲響，彷彿全世界吵成一團。」我相信「反事實」與「虛擬」歷史——或者更通俗的說法，假設性歷史——將會越來越受歡迎；然而，這種形式的歷史究竟只能算是消遣娛樂（夏瑪〔Simon Schama〕稱之為「童話故事」），抑或是思索歷史上未曾發生之事的確多少有助於瞭解歷史真相？

檢視自己的人生就能理解，只要更動某日的一件瑣事，有時就會對所有事物產生巨大的效果，可能影響數年，也可能影響一輩子。對個人如此，對歷史來說何嘗不是如此，歷史不就是一段與數百萬人生活有關的故事？如果沒參加那場直到最後一刻才加入的可笑酒會，你就不會遇見你的另一半。如果沒有在那天買報紙，你大概就不會得到現在這份工作。再舉個極端的例子，我的朋友——新聞記者艾波鮑姆（Anne Applebaum）——原本要搭乘洛克比空難班機，卻在最後一刻因故不得不改變旅行計畫。

假設的情況若是真的發生，也可能毀掉人們的生活。一九六五年，莫羅（Ed Murrow）曾對溫莎公爵夫婦進行電視訪問。這位資深的美國廣播人詢問這對流亡夫妻，他們是否曾經想過「如果當初沒那麼做，將會如何」的問題。夫婦倆先是吞吞吐吐，彼此緊張地交換眼神，然後原本埋在沙發中的公爵身體微微前傾，斷然地說，他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之後，公爵夫人以極為矯飾的語調說：「難道你忘了我們曾在蜜月時約定，誰也不許提如果當初沒那麼做將會如何？」公爵趕緊接著她的話回答：「沒錯，我們的確有過約定，而且我們從未談過此事。」他們的肢體語言、苦悶的眼神和語調，以及笨拙的謊言，清楚顯示他們內心並沒有停止想著「如果當初」的問題，而他們也因此飽受折磨；然而，不可否認地，換做是他人，要將這股念頭拋諸腦後也是強人所難。

葛妮絲派特洛主演的電影《雙面情人》（*Sliding Doors*）明白宣示，光是一場意外就足以改變整個歷史計畫。在電影中，由於女主角沒搭上地鐵，因而未能及時發現男友和別的女人上床。另一個版本則是，地鐵的車門晚了幾秒關上，女主角及時搭上列車，並且發現男友背著她偷情；此後，女主角的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變化。《雙面情人》呈現的是兩段並行的故事情節，描述最初的偶然如何影響女主角隨後的生命發展。這部電影傳達出這個世界並無定數可言，所有的事件都在偶然中發生，而且在偶然中觸動了另一事件。莫洛亞（André Maurois）曾說：「沒有任何過往能擁有特權……這個世界存在著無數過

往，每個過往都同樣有效……在任何時點與片刻，無論你覺得有多麼短暫，事件的發展就像樹幹長出孳生枝桠，隨時可能發展出兩條分歧的路線。」

當然，這樣的思想路線勢必激怒輝格派（Whig）人士、馬克思主義者與決定論者，以及那些相信預定論或命運神意決定人類存在的人。卡耳（E. H. Carr）——馬克思主義史家，同時也是列寧主義的辯護者——在他極富影響力的大作《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中，抨擊反事實歷史「與歷史無關」，是「閒人用來排遣時間的小把戲」。湯普森（E. P. Thompson）曾用某個德文詞彙貶低反事實歷史，由於可能有家庭讀者購買本書，因此我不便將它譯成英文。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想必也同樣抱著輕蔑態度，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行動總是以預先決定的辯證唯物論為依歸，而非源自於反覆無常的意外與偶然。

雖然反事實歷史遭到卡耳、湯普森「與」霍布斯邦的責難，但是對我來說，反事實歷史有其可取之處；尤其是從讚許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有傑出的支持者與反事實歷史學者，例如吉朋（Edward Gibbon）、邱吉爾、卡萊爾（Thomas Carlyle）、納米爾（Sir Lewis Namier）、戴克爾（Hugh Dacre）、尼可森（Harold Nicolson）、柏林（Isaiah Berlin）、諾克斯（Ronald Knox）、路德維希（Emil Ludwig）、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費雪（H. A. L. Fisher）、康拉德·羅素（Conrad Russell），以及令人賞心悅目的葛妮絲派特洛（康拉德·羅素

曾冷靜且審慎地提到：「如果我們未能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冬天發明新合金與新火爐，就無法強化噴火式戰機的螺旋槳外殼；噴火式戰機的時速將因此比德國 Messerschmitt 戰機慢八十公里，而非快八十公里，希特勒很可能因此贏得戰爭」。

前萬靈學院院士克拉克（Jonathan Clark）教授的新作《被遮蔽的現在：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歷史》（*Our Shadowed Present: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y*）是個有力的思想例證，書中運用了反事實工具——雖然運用次數不算多——來研究歷史。身為史學史領域中學識最淵博的托利派（Tory）思想家，克拉克教授堅定地認為，現代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都太專注於他所謂的「對真實的偶像崇拜」。克拉克在結論中指出，從他專攻的「漫長」十八世紀可以發現，

〔革命〕行動當初其實很可能成功，然而，主導的意識型態在解釋時卻對此略而不提，而且在回溯時將革命行動貶低為孤注一擲。就像法國企圖於一七四四年入侵英國，以及於一七九七至九八年暗中支持愛爾蘭叛亂，這兩個例子都是外國勢力企圖以軍事力量介入來引發內亂，只是這些計畫最終未能實現；然而，如果這些計畫當初能順利進行，如同一六六〇年、一六八八年與一七七六年那樣，歷史將會完全改觀。

克拉克又說：

對反事實歷史的惡感並不能減損反事實歷史的力量。就算我們不加思索地偏愛現代主義的既成事實與自明真理，或者偏愛後現代主義承諾的無限解放，反事實歷史仍默默撐起重構歷史大事的重任；唯有具強烈目的性的意識型態才會責難這種開放性的另類歷史思考，並且認為反事實歷史是被不切實際的懷舊情緒驅使，終究難登大雅之堂。

具強烈目的性的意識型態很多，克拉克是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嚴詞抨擊這種想像過往的概念，然而談到想像，真正的行家卻是馬克思主義者自己，因為他們沿街叫賣可笑的未來想像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馬克思主義者想像了各種未來，其中之一便是全世界的國家都會消亡，只留下人民階級專政的獨裁政體。這種統治形式尚未在人類史上出現——西班牙內戰期間持續數月的巴塞隆納政權也許是唯一例外——因為它所立基的三個理想——自由、平等與博愛——已不只一次顯示出彼此的互不相容。

同樣地，輝格派的歷史觀——認為人類一定會走向自由民主與博愛的世界——也有嚴重瑕疵。如果過去這一百年來，連德國這樣的國家——堪稱當時世上最文明也最先進的國家——都能做出兩次猝不及防又殘忍的野蠻行為，歷史——如麥考萊（Macaulay）認為，人類歷史正走在正確的軌道上，終有一天臻至完美——當然有可能像火車頭一樣倒車後退或出軌，甚至撞個粉碎，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以及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

年的德國。

輝格派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早該被較可信的理論取代，而反事實歷史正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提醒我們沒有任何路徑被預先決定。在反事實歷史的世界觀中，人類是墮落又帶有原罪的存有，一方面努力學習上一代以超越上一代，另一方面也不斷意識到腳下正踩著地獄深淵；一方面熟悉已知的過去，另一方面則懷疑自己是否真能到達未知的未來烏托邦。

納米爾曾說：「歷史研究的不朽成就，在於使人們產生歷史感——一種直覺的理解——來思索事件未發生前的狀態。」歷史學家與傳記作家總是發現，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就是牢記他們研究的主角不可能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就像我不可能精確預測，明天下午三點二十分在阿特塞克特將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對過往瞭若指掌，卻對下一分鐘的未來一無所知，因此沒有理由自認為較過去的歷史人物更優秀。我們可以站在全知者的角度看歷史，歷史人物卻必須在每日的摸索中做決定。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三日，當時的法王路易十六還鎮定地想著隔日要到楓丹白露打獵，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真是愚蠢至極；但我們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隔天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監獄將會發生事情。與其對波旁王室的愚蠢沾沾自喜，不如好好思考後世的人們會將我們看成什麼樣的白癡，只因我們未能察覺手機或太空旅行為西方文明帶來的致命危險。

歷史學家考利——本書作者之一——認為，在一個對過往

歷史所知不多的時代裡，「反事實思考有助於喚醒並培養歷史的想像」。考利相信，在學校和大學中太常出現這樣的情景：「學生的印象是，歷史不可避免，已經發生的事不可能以其他方式發生。在教科書中，哪裡看得到彼此衝突的意志、動機與觀念，彼此對立的經濟與社會力量，以及意外和偶然構成的戲碼？……透過反事實的嚴謹檢視，可以凸顯對峙與決定的利害關係，並且聚焦在真正的轉捩點上。」

此外，如果我們不認同所謂的歷史必然性與預定說，就應該放棄對政治的冷漠——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通病——因為這意味著人類事務充滿了各種可能。〈未來會如何〉（Che sara, sara）這首歌是每個時代的敗家子共通的哲學，在一個充滿偶然與意外的世界裡，這種哲學沒有地位。

我的書桌上擺著一封裱過的信，這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於一九五九年寫的：「歷史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人們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若能適當地運用想像歷史，或許能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回顧過往，獲得新的教訓。我們發現過去的決策者曾經面臨許多源源不斷的機會，對他們來說，過往的數量如同恆河沙數般無窮無盡；此外，我們也發現機會與意外在人類事務中扮演的角色。這些想法能讓我們免於驕傲，並且提醒我們，當初在路口轉角處很可能遭遇另一種情況，現在仍是如此。

巴斯卡於十七世紀首次提出克麗歐佩特拉鼻子的歷史理論。他認為，如果克麗歐佩特拉的鼻子長或短個半吋，整部羅

馬帝國史都將因此改寫；然而，這種說法並不可取。正如一隻在亞馬遜河流域拍翅的蝴蝶，不可能真的在特倫特河（Trent）上空造成雷雨；此外，印第安人把石頭扔進安大略湖，並不會真的改變地球重心，因果的連繫必須可信。除了埃及豔后的性吸引力與鼻子之外，凱撒與安東尼的行動背後其實還存在著其他動機，這些動機也可能讓凱撒與安東尼對克麗歐佩特拉失去興趣。

在卡萊爾的英雄歷史理論與決定論者的觀點之間，一直存在著哲學爭論，艾略特（T. S. Eliot）曾稱後者為解釋歷史的「廣大非人力量」——例如工業化、唯物論、無產階級化、科學的興起與巫術的沒落。在決定論中，巴斯卡的「歸謬法」完全沒有適用的空間。假設性歷史的第一條規則是，只要可信就有可能；我們只是調偏一根琴弦，而非讓小提琴完全走音。

我們也必須提出反事實歷史，找出與實際事實相近且最有可能出現的另一種結果。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希特勒的父母未曾相遇，將會發生什麼事；但同時必須提出另一種可能，某個幾乎與希特勒同樣憤世嫉俗及狂熱的人物，於一九三〇年代初當上德國總理，當時其實並不缺乏這類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政客。歷史學家盧卡斯（John Lukacs）曾假設老羅斯福於一九一二年贏得共和黨提名，因此提早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如此，老羅斯福仍無法阻止第二次歐洲戰火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點燃。

威靈頓公爵瞧不起反事實歷史，他在評論克勞塞維茨的

《戰爭論》時說：「思索從未進行的軍事運動與從未發生的作戰，沒有任何意義。」不過，威靈頓公爵提到滑鐵盧之役時卻說：「如果當時我未參戰，此役恐怕無法獲勝。」這句發人深省的話其實就像假設性歷史。幾位法國史家假設拿破崙在聖約翰山（Mont St Jean）的山坡上獲勝。拿破崙一方面回想在那個可怕的星期日下午哪裡出了差錯，另一方面則想像自己在滑鐵盧之役獲勝，而他也將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他在戰後與盟軍達成協議，停止戰爭，安定而專心地統治法國，死後由羅馬王繼承王位。然而，就當時的情勢來看，這個未來似乎不太可能出現。一八一五年，列強已經摸清楚拿破崙的真正實力，即使拿破崙贏了滑鐵盧之役，最終也必須屈服於五十萬反對他的俄奧聯軍之下。

第二條規則是簡潔有力。佛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在為《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所寫的權威導論——一篇關於反事實歷史哲學的假設性文本——中指出，這種文類特別適合以論文方式表現，而非長篇大論的書本。最佳的假設性歷史作品由史奎爾（J. C. Squire）、考利、諾斯（Jonathan North）、邁克塞（Kenneth Macksey）、楚拉斯（Peter Tsouras）與佛格森編輯而成，集結了幾位作者寫成的短篇論文。假設性文章的篇幅若長達數百頁——如德雷福斯（Richard Dreyfus）的《喬治·華盛頓與英王喬治三世》（*The Two Georges*）假設美國獨立革命並未發生，或哈里遜（Harry Harrison）的《永遠的星條旗》（*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假設英國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支

持南軍——將會顯得誇大不實。這就跟打撞球一樣，一般人可以知道A球擊中B球時會如何，職業球員則能推算出B球擊中C球、甚至C球擊中D球，但是要精準預測F、G與H球就不可能了，特別是當A、B與C球還在撞球桌上滾動時。

純屬杜撰的小說則是另一回事：有兩部傑出的作品，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祖國》（*Fatherland*）與埃米斯（Kingsley Amis）的《俄國秘密警察》（*Russian Hide-and-Seek*），後者以蘇聯占領下的英國為背景。另外還有凱斯·羅伯茲（Keith Roberts）的小說《孔雀舞曲》（*Pavane*），場景是被西班牙無敵艦隊征服的英格蘭。《孔雀舞曲》有一段精采的開場白：「一五八八年溫暖的七月向晚，一個垂死的女人倒臥在格林威治皇宮中，刺客的子彈射進了她的腹部與胸部。」（本書第一章即為安·索瑪塞特對無敵艦隊戰勝的預言。）埃米斯相當熱中於假設性歷史的寫作，他的小說《改變》（*The Alteration*）描述的是未曾經歷宗教改革的英國，那是個唱詩班男童為了保留美妙童聲而接受閹割的時代。在談到「邪惡日」（Day of Infamy）的精采論文中，埃米斯讓日本艦隊通過巴拿馬運河，前去砲轟曼哈頓。假如你認為這聽起來不可置信，可以閱讀二〇〇二年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的文章，上面提到德皇曾經認真考慮砲轟紐約，並且派遣十萬大軍登陸美國東岸，其情節宛如《沙岸之謎》（*The Riddle of the Sands*）的越洋放大版。

假設性歷史與科幻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既不會讓列

寧擁有核子彈，也不允許克倫威爾部署棕管步槍；不過，隔代傳承是可以的。曾有軍事史家的論文提到，假如威靈頓的部隊使用長弓，而非火繩槍，戰果將會更大。雖然長弓從阿讓庫爾（Agincourt）之役以來已歷經四百年，但是其準度、阻滯力及射速都遠優於火繩槍。軍事方面的假設性歷史經常出現傑作，這是因為為了避免失真，人們通常會將戰時的主要決策變因控制得少越好。俗話說，人類一計畫，上帝就發笑；而且，往往戰爭一開打，計畫就無法執行，這顯示戰爭原本就無法預測——索伯（Robert Sobel）有一部傑出作品談到，柏戈因（John Burgoyne）若是在薩拉托加（Saratoga）獲勝，將會造成什麼後果。這本書的書名就叫做《只因缺了根釘子》（*For Want of a Nail*）。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反事實分析使用最多的領域，次數遠逾其他軍事衝突。出版商格倫希爾（Greenhill Books）甚至有個書系專門介紹二次大戰各種不同的結局，有幾篇極為寫實的論文寫到：如果英國遠征軍在敦克爾克被俘；如果法國一直堅守到一九四〇年；如果佛朗哥將軍加入軸心國；如果俄國入侵德國，而非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如果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進攻中東而非俄國；如果布雷契理（Bletchley）未能成功解開德軍密碼；如果隆美爾在阿拉曼（El Alamein）獲勝；如果德國科學家發明原子彈；如果德國潛艇贏得大西洋海戰；如果諾曼第登陸的部隊被趕回海上；如果德國將領們的七月密謀成功；如果原子彈突然在廣島與長崎上空故障。當然，作者總會

在某個時刻跨出研究的範圍，進入想像的未來，但是這些論文都是由卓越的史家撰寫，如基根（John Keegan）與歐弗利（Richard Overy），他們構築的場景鮮有不合理之處。今日，軍方將領會做兵棋推演，政治人物偶爾也愛好此道；如果兵棋推演不針對可能發生的反事實情節進行檢視，那還有什麼意義？

假如納粹贏得二次大戰，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他們（而非美國人）將會率先登陸月球。德國火箭科學家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曾主持希特勒的火箭計畫，戰後成為美國太空研究計畫總設計師，並鼓吹甘迺迪進行登月計畫；就在計畫提出後幾天，甘迺迪便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月球上會不會升起納粹的卐字旗而非星條旗？寧靜海會不會改名為優越的亞利安人之海？這並非全無可能。

另一個極有可能發生的場景——從邱吉爾動盪的一生來看不無可能——是邱吉爾未能於一九四〇年領導全英國人民與大英帝國。邱吉爾轟轟烈烈的一生可能因英年早逝而突然中斷，他未能活到退休的年歲，因此也未能成為首相。當然，像哈里法克斯或伊登、艾默里，或甚至安德森、貝文、艾特禮或克里普斯，都可能領導英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人們能想像這些人會讓英國發出獅子般的怒吼嗎？樞機主教紐曼（Cardinal Newman）說，他在歷史中尋找上帝的手指，但是卻徒勞無功。赫爾斯罕姆（Lord Hailsham）則相信，邱吉爾就任首相當天，希特勒就向西方發動閃電戰，這是他唯一能辨識出上帝直接干涉人類事務的時刻。這當中容有決定論解釋的餘地（雖然我不

做如此解釋)，但無論決定論者的看法為何，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假如邱吉爾未能擔任首相，戰爭過程恐怕不是我們所能想像。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擲骰子，我認為赫爾斯罕姆的意思是，上帝為了保護祂的心血免於淪入邱吉爾所說的「新黑暗時代」中，因此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給了人類文明一個抵抗的機會。這種想法固然浪漫又具啟發性，但是對我而言，這種上帝偶然間傾斜了人類歷史天平的想法，其可信度還不如一些平淡無奇的看法，例如哈里法克斯不願接任首相，以及沒有人有充足的能力取代邱吉爾。

有時，假設性歷史會使我們對自身的民族認同產生懷疑，「假如希特勒於一九四〇年入侵英國，結果將會如何」就是個好例子。在經過六到八週英國國防民兵的奮勇抵抗之後，英國人還能像法國人與海峽島嶼居民一樣團結嗎？特別是當英國難以期望從數千公里外中立的美國獲得補給時。針對這個問題，人們脫口而出的答案往往觸及如何定義英國人的問題核心。

因此，那些認為假設性歷史只是排遣時間的小把戲、實際上並無用處的人，應該看看本書收錄的史達林諱莫如深且差點就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發生的事件，有些史家——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歷史類節目總監瑞思（Laurence Rees）——甚至認為，這一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天：就在這一天，史達林決定不搭乘他的專屬列車離開莫斯科，逃往烏拉山區；相反地，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堅守莫斯科。

假如史達林離開莫斯科的消息傳開——所謂紙包不住火